

以中国眼光审视爱尔兰

杰鲁莎·麦科马克 (Jerusha McCormack)

作为一个身处中国的爱尔兰人，回望自己的祖国是一件很离奇费解的事情。

首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要找到爱尔兰并不容易，因为它既狭小又偏僻。爱尔兰人可能会觉得这点不可思议：为什么当我们身处爱尔兰时，这个国家显得那样庞大？因为这个国家国土面积虽小，却相当复杂？因为充满动荡的历史使其国民过分关注自己的国家？还是因为爱尔兰也与其它民族一样，不能免俗地把自己摆在了世界的中心？

当然，我们爱尔兰人之所以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其实际领土面积更大的原因之一是“爱尔兰人”这个概念早已不再局限于地缘政治学所界定的单一民族国家的范畴。早在“全球化”这个词生成以前，爱尔兰的海外移民就一直在挑战“归属”这个概念。现在，爱尔兰海外移民的后代几乎遍布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尽管这些移民可能仍然对爱尔兰的某个城镇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心中的“爱尔兰人”这一概念却早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既然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已不足以界定“爱尔兰”，那么“爱尔兰人”这个词又包含了怎样的丰富涵义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在亚马逊网上，搜索这个词条能找到60万篇文章和书籍。显然，“爱尔兰认同”这个概念很难界定，而中国人对这个概念尤其困惑。首先，中国人会发现，笼统地称为“爱尔兰”的这个岛屿，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爱尔兰”，而是在政治上分成了两个辖区。东北角大部分土地属于英国（被称为“北爱尔兰”或者“乌尔斯特”）。而另外的四分之三则是爱尔兰共和国的领土，这一部分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爱尔兰”。北爱尔兰人在名义上是英国公民。尽管如此，两个辖区的居民都可以认为自己是“爱尔兰人”，并有权获得爱尔兰公民身份。

这还不算什么，更让中国人困惑的是，人们常说爱尔兰人无处不在，这个说法在字面上也几乎是成立的。目前，12%的美国人、14%的加拿大人、9%的澳大利亚人声称自己拥有爱尔兰血统。10%以上的英国人至少父母一方是爱尔兰人。

中国人可能会问：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其国民究竟是怎样如此有效地渗透到其它国家呢？有很多原因。其一是爱尔兰人都深深地因自己的爱尔兰血统而骄傲，这种自豪感——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往往通过记忆在海外移民中代代相传。针对这一点，爱尔兰宪法规定，任

何人只要能证明他/她的父母或祖父母有一方出生于爱尔兰就有权申请爱尔兰国籍。由于这个规定，尽管爱尔兰共和国目前的人口只有 400 万，却可以号称其实际人口数是这个数字的 20 倍。

中国人还需要理解的是，谁是“爱尔兰人”这个问题由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变得更为复杂。“爱尔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成立于 1922 年。在此之前，声称自己是爱尔兰人是根据长期流传下来标准：或是因为爱尔兰是他们生长的地方，或是因为某种笼统意义上的政治/民族认同使他们与英国统治者格格不入。很难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历史上和现在造成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这种差异，但很显然，从两个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各自不同的语言和对罗马天主教的态度中可见一斑——爱尔兰语仍然是爱尔兰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可能萨缪尔·贝克特的说法是到目前为止最为清楚明了的概括了。这位著名爱尔兰剧作家在 20 世纪中期旅居法国，有人问他是否是英国人时，他回答说：“恰恰相反，作为爱尔兰人正意味着与英国的对抗。”

殖民时期英国与爱尔兰的对抗更为显著。在英国的统治模式中可以准确地发现这种对抗的存在，尤其表现为英国摒弃爱尔兰本土语言和爱尔兰人的宗教信仰——亨利八世和他的继承者们任命自己为 1534 年成立的英国国教教主，限制罗马天主教的发展并使之边缘化。英国统治不仅反对爱尔兰人的语言和传统信仰，还试图将英国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文化强加给爱尔兰。爱尔兰人反对英国的生活方式，是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化，但这种文化在英国统治的压迫下正走向灭绝。这些爱尔兰元素不胜枚举，但可以肯定的说它们构成了一整套爱尔兰文化或爱尔兰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它们与英国文化或行为方式似乎是截然对立的。

在英国殖民统治问题上，关于民族文化这一层面，爱尔兰人和中国人的态度可谓大同小异。但在这个问题的其他层面，两国就颇有出入了。爱尔兰是英国最早征服的殖民地（殖民历史约始于 1540 年），与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的关系更为微妙复杂。许多爱尔兰人在英国殖民地担任过重要的行政长官，这表明爱尔兰所谓的“对抗”——尤其是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对抗”态度相当复杂。当然，只有在 1916 复活节起义将近一百年以后的今天，爱尔兰人才逐渐接受并认识到自己不仅仅是英国压迫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英国的同谋，在维护其它国家所谓“英国压迫者”的统治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在英国殖民地担任过行政长官的爱尔兰人之一是鹭宾·赫德，史称 19 世纪后期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据史学家称，与他同时期的外国人中没有人比赫德“拥有更持久的影响力，获得更多中国人的信任”。赫德 19 岁就来到英国驻华领事馆工作，9 年后已成为清政府任命的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个位子上干了 40 年，在中国与西方签署重要国际条约的过程中能够参与协商，左右逢源。但到底是怎样的禀赋使赫德能够在中西官员间游刃有余呢？

首先，鹭宾·赫德没有忘记自己的爱尔兰出身。尽管赫德讣告里称之为英国人，但他实际上出生于北爱尔兰的乌尔斯特，此后在爱尔兰生活了 18 年。终其一生，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母校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此外，作为总税务司，赫德积极地在中国海关税务总署安插母校及其附属院校（当时的考克和戈尔韦女王大学）的毕业生。作为爱尔兰人，赫德深知“关系”的重要性，在中国，他把爱尔兰人的这一传统观念发挥利用到了极致，甚至毫不避讳地在海关安插自己的家人。在为自己的做法辩护时，赫德曾说：“我从未因为选用一个人而埋没另一个更有能力的人，但如果是要提拔两个能力相当的人之一，而其中正好有一个跟我有血缘关系，那么不提拔这个人就太不正常了。”

但忠于自己的爱尔兰出身并不总是那么简单。许多殖民地的官员都与英国国内贵族攀得上亲，信奉英国国教，毕业于牛津或剑桥。相比之下，赫德出身于不服从国教、信奉循道宗的中产家庭，毕业于北爱尔兰“穷乡僻壤”里的一所大学。因此，从出生那一刻起，他就偏离了以国教、牛津剑桥和地主乡绅为标志的主流社会，处于边缘地位。

另一方面，因生长于乌尔斯特的赫德在爱尔兰也算局外人，他到中国后这反倒成了自己的优势。据赫德日记的编者称，赫德从一开始注重观察中西文化差异，十分关注中国的礼节、礼仪。来到中国后，赫德不再囿于狭隘的民族身份，时而自称爱尔兰人，时而称自己是英格兰人，甚至有时是英国人。可能正是这一原因，赫德关注人际关系甚于国家间的问题，在与中国的高级外交官员——总理衙门的官员们的私交上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尤其与晚清总理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訢私交甚笃。

在华 40 年，赫德记下了详实的日记。这些日记和私人信件揭示了他接受多重身份的惊人能力。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他的爱尔兰认同：来华第一年他就写道：“我是个爱尔兰人，从灵魂到骨子里的爱尔兰人。”当然，赫德的血统观念使他疏离自己的“英国身份”——在任用海关总署官员时尤其如此。在 1893 年写给英国朋友金登干的信中，他坦言：“我并不支持把在本土生活多年的英国人派到中国来，英国人不太适合这个环境，又不擅变通。要在中国取得成功，势必要研究、考虑本地的需要和条件，英格兰人太过狭隘了！”

赫德用明确无误的语言表达了对英格兰员工不擅变通、无法适应本地需要和条件的失望。赫德本人恰恰具备这种灵活变通的能力，在自己的多种身份之间游刃有余。当然，在赫德的圈子里，他的这种做法所导致的结果不难预料。正如汉学家史景迁指出：赫德始终面临来自英国商人和领事的责难，指摘他偏袒中方；与此同时，他还受到中方同样的责难。事实上，英国人总是对他表现出来的“中国化”的倾向深感不安（从1894年《名利场》上刊载的漫画中可见一二）。虽然赫德已受到中国文化的同化，但其本人却并未感觉到自己的多重角色之间存在多大冲突。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创造个人身份的自由来自其背井离乡的自我放逐的经历。赫德生于乌尔斯特——英国政府治下爱尔兰岛上的一个省份，但他显然并不自觉有必要在诸多身份中做出非此即彼式的选择：赫德自认为是英国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抑或是乌尔斯特人。在中国时，他形成了一种近乎完全实用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身份政治。在此过程中，他身为爱尔兰人的经历起了重要作用。赫德天生就懂得“关系”的作用，因为爱尔兰人处理大多数事务时也遵循同样的传统。赫德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能够合理利用（通常是爱尔兰人的）私人关系获取共赢的利益。

如果赫德留在爱尔兰，他的职业生涯可能大为迥异。约一个世纪以前，身份政治在爱尔兰试图摆脱英帝国统治的斗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政治上，新崛起的民族国家要想证明自身主权的合法性，必须明确界定自己与邻国的差异。因此，在强调自己与英国不同的斗争中，19世纪后期的许多爱尔兰思想家就何谓“爱尔兰”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讨论——（总的来说）这场讨论的主题是“爱尔兰”不等于“大不列颠”。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赫德留在爱尔兰，他很可能像其它身处爱尔兰的人们一样，被迫信奉一种更为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个人认同观。

即便在今天的爱尔兰共和国，一些人仍然相信作为爱尔兰人意味着单一、稳定、确定的身份认同，但重要的是爱尔兰人是否已把这个问题琢磨清楚。例如，在爱尔兰国家电视台准备制作一档关于爱尔兰人与中国的系列节目时，关于鹭宾·赫德的节目制作就遭遇了反对的声音，理由是作为英国殖民官员，赫德过于英国化，因而，对于主流思想所认同的“爱尔兰人”身份而言是一个背叛。更令人惊讶的是，曾有人反对关于罗斯家族——一个英国殖民时期在爱尔兰册封的伯爵家族的节目，理由是“罗斯伯爵不是爱尔兰人”。罗斯家族17世纪后期就已定居爱尔兰。

兰，而反对播出该节目的人，却是一位 20 世纪 70 年代初才从他国移民而来的外国人（可以想见，这位对播出该节目持反对意见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包含的讽刺意味）。

因此，尽管爱尔兰人在结束政治暴力历史的努力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我们仍未从因这段历史而形成的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上事例表明，至少在爱尔兰，何谓“爱尔兰人”仍然是个有多种答案的难解命题。然而，在最近几年里有两个事例表明“爱尔兰人”的自我界定正回归多元化。其一是 1994 年的大河之舞，其二是 1998 年的《贝尔法斯特和平协定》。

大河之舞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2002 年麦卡利斯总统访华期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上演，并于 2009 年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成为该晚会唯一的外国节目。但为何大河之舞会在中国倍受欢迎？它又向中国和爱尔兰观众传达了怎样的爱尔兰形象？

首先，大河之舞的风格新颖、充满活力。舞蹈节奏轻快复杂。它强调速度、节奏、协调并（在传统爱尔兰舞蹈演员看来）包含高超的杂技技巧。上百名舞蹈演员一丝不苟地踏着整齐的舞步、展现出的超凡的技巧、活力和杂技般的高难动作都令中国观众激动不已。

鲜为中国观众所知的是大河之舞与爱尔兰本土的传统舞蹈相去甚远。他们也不知道这样的舞蹈形式其实源自上世纪早期一场白热化的文化之争。当时，一些旅居伦敦的爱尔兰人于 1893 年为推广爱尔兰语成立了一个政治团体——盖尔民族联盟。该联盟促成了传统爱尔兰舞蹈的复兴。为了定义并维护“纯正”的爱尔兰舞蹈，使之与“英格兰”或“英国”的版本有所区别，盖尔民族联盟制定了许多规则来规范舞蹈比赛。这些规则在爱尔兰自由邦成立一年后的 1923 年正式生效，并成为日渐官方化的传统爱尔兰舞蹈规范。

作为诸多规定之一，爱尔兰传统舞蹈通常由单人表演，最多双人。在高端的比赛中，舞步被看作是舞蹈演员的个人创作，不能在舞蹈演员之间共享。大河之舞中模仿远古的鼓点和深受观众喜爱的鞋跟动作，其实（按照规定）被排除在爱尔兰传统舞蹈之外。此外，在爱尔兰舞蹈比赛中也不允许选手身着相似的服装。因为（设计精致的）服装也被视为舞蹈演员的个人创作。最后，规定禁止手臂的动作，手必须紧贴在大腿两边；舞蹈演员必须昂首挺胸、全身挺直、面无表情。杂技动作因为过分“用力”，俨然“毫无廉耻地出风头”而背离传统爱尔兰舞蹈，受到公开谴责。

但大河之舞违背了所有这些规矩。人数众多的队列取代了单人表演并反复出现，队列中的舞蹈演员装束完全一样，并可以相互替代。相对于舞蹈比赛参赛者们设计精良的绣花服装，舞

蹈演员身着简单平滑的衣服。他们步法一致，动作整齐划一。他们的鞋都有鞋跟。他们来回摆头并挥动手臂。主要演员的表演是粗野的出风头，当她们彼此面对时还四目相对、相互微笑。

自大河之舞问世以来，爱尔兰舞蹈从此面目一新。从中国角度来看，爱尔兰舞蹈较之官方标准，演变得更加接近中国的想象。传统舞蹈侧重个人甚于团体、个性甚于共性，但大河之舞则代表着世人眼中爱尔兰未来的新面貌。

大河之舞的成功秘诀之一在于所谓“爱尔兰人”的定义得到前所未有的延伸，但同时又没有完全与过去的传统脱节。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大河之舞仍指向一切传统的起始点：新石器时代。这个时代全世界的文化艺术——中国的也好，爱尔兰的也好——都相去不远。大河之舞中暗示新石器时代纽格莱奇墓的舞台设计及其螺旋状标志令人想起讲述河流、太阳、暴雨和爱尔兰史前英雄的远古神话故事。最具代表性的是表演甫一开始艾纽纳合唱团演唱的飘渺歌曲所带来的大河女神的轻声曼语：“我是你们的庇护者，我拥抱着你们……我会滋养你们，抚育你们……。”这种大河女神崇拜具有超越时空的吸引力，对于以河流为文明发源地的中国尤其如此。

大河之舞的网站更进一步将演出定义为“人类的故事”。其出色之处部分在于它重述了世界上大部分民族共有的历史——对太阳、月亮和母亲女神的崇拜。舞蹈还讲述了许多民族都经历过的压迫，以及他们反对压迫取得的伟大胜利。代表斗争不懈的爱尔兰形象的凯瑟琳夫人，在大河之舞中经过改编，成为伯爵夫人，是讴歌女性重获权力的胜利的化身。战败身死的武士库秋林，则升华成爱尔兰人虽败犹荣的荣誉感的象征。这些故事各自讲述着失败、成功和历经失败终获成功。这个主题在一则讲述近代史的故事里显得更加明晰。这段关于爱尔兰移民的舞蹈是为1996年在纽约的演出特意编排的。这段舞蹈里，代表19世纪爱尔兰移民和当地美国黑人的舞步在福音合唱团的歌声中交错，以浪漫主义的隐喻手法为观众呈现关于压迫与生存的斗争。

这些场景中蕴涵着即兴表演的味道，下个场景是什么观众毫不知情。除此之外，观众还能体会到爱尔兰元素和非爱尔兰元素的随意糅合。比如，观众可以听到，演出中不仅使用了小提琴、弯管等传统爱尔兰乐器，还出现了（保加利亚的）弦乐器（gadulka）、长笛（Kaval）和风管（Gaida，巴尔干人也会演奏）。同样，舞蹈也渐渐变成一种混合体，其中不乏美国黑人、西班牙和俄罗斯风情。然而，西班牙和俄罗斯舞蹈与爱尔兰又有多大联系呢？

答案可能是二者既可说是息息相关，又可说毫无联系。舞蹈是稍纵即逝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因此编排时选材的范围最广。把一个舞蹈演员的步法教给另一个演员已属不易，把一代人的舞蹈技巧传承下去更是难上加难。爱尔兰舞蹈其实源自多个传统，像许多民间艺术一样，从欧洲大陆乃至更远方的文化里兼收并蓄。爱尔兰与（同样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关系密切，无怪乎一次著名的 DNA 抽样测试，检验爱尔兰西部部分人群，发现他们数千年前祖居西班牙北部（在更久远的年代，他们可能来自东欧的游牧部落）。

DNA 可以通过人类的血脉延续、传承，但文化传统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却难免发生变化。谁也说不清弗拉门科舞和爱尔兰舞之间有何联系。但有研究表明爱尔兰的传统舞蹈与科纳马拉舞蹈可能会有渊源。后者在表演时，要求演员一边跺脚，一边举手过头打响指。爱尔兰和西班牙的大河之舞同台演出时，任何人都能立即看出其的共同之处：二者都用脚步模仿鼓点的节奏，演绎激情洋溢的故事。

然而俄罗斯元素又从何而来？同弗拉门科和爱尔兰传统舞蹈一样，它源自民间，因为它急促有力。但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它跟爱尔兰舞蹈毫无关联，它出现在大河之舞里仅仅因为制作人想把它加进来。在爱尔兰国内看来，这段舞蹈不仅出处不同，而且还有投机取巧的嫌疑，仿佛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增加一点儿新鲜感。在爱尔兰观众眼里，它可能显得不切主题，稀释了原本纯净的爱尔兰元素。但在外行眼里，这个所谓“爱尔兰人”的新定义却因为其多元化的构成和取悦观众的投机成分的存在而显得恰如其分。在这层意义上，大河之舞不正给予我们一个关于“爱尔兰人”的新定义吗？

可能中国人对大河之舞的热衷能帮助我们找到定义“爱尔兰”的关键因素。其实，在今天这个经济衰退的艰难时刻审视大河之舞，人们难免有感于其中如此远离爱尔兰现实的讽刺意味。中国观众从大河之舞中看到是其高度的同步性：百名舞蹈演员以整齐划一的动作踏出精确的舞步。而爱尔兰人在本国看到的正恰恰相反：多重利益在相互冲突下发出刺耳的声音，导致爱尔兰难以制定一个广泛接受的国家政策来拯救国家于经济危机的水火之中。诚然，对现在生活在爱尔兰国内的人们看来这个国家显得并不狭小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支持不同利益的声音无处不在。在此境况下，中国对爱尔兰的看法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提醒爱尔兰人：无论这个国家拥有多么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爱尔兰仅仅是一个人口相当于中国普通城市的小国。而且，爱尔兰

兰经济仍受世界上主要力量的左右，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外界对大河之舞的认识告诉我们，这种开放性不仅可以被理解成不足，它还是一个机遇。

作为爱尔兰公民，我们拥有一个独特而复杂的命运。不同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公民，我们可以同时拥有其他国家的公民身份，使用该国的护照，在该国定居。这是由于爱尔兰宪法的规定，也因为爱尔兰是欧盟的成员国。另外一个独特之处是根据 1998 年《贝尔法斯特和平协议》，所有北爱尔兰人可以有权选择自己的国籍——自称爱尔兰人、英国人或同时身兼两国国籍。这个决定弥补了 1922 年爱尔兰岛南北分裂带来的创伤。

这些法律突破了从地理和/或政治范畴界定爱尔兰人的做法，证明爱尔兰的界定不是地域上的认同，而在于其人民。过去 10 至 15 年间，爱尔兰人民这个概念经历了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源自欧盟的制度，还同样得益于爱尔兰的繁盛。过去十年里，爱尔兰的人口迁移方向发生了逆转，这个国家已变成欧盟和非欧盟国家移民的目的地。因此，现在爱尔兰人口中，有一部分是来自 150 个国家、使用近 170 种不同语言的移民。在此背景下，爱尔兰人再也无法回到单一民族文化的思维定式。不仅向国外输出多重身份的公民，其国内的人口构成也开始变得复杂多样。

我们曾苦苦追寻一种独有的“爱尔兰”认同，使自己能同世界其他国家分庭抗礼，但今天这些移民的涌入又给“爱尔兰人”的涵义带来新的挑战。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完全放弃“民族认同”这个说法，采用包罗更为广泛的“爱尔兰认同”这一多重认同的概念。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大河之舞正是一个出色的榜样。值得注意的是，爱尔兰作为一个狭小的岛国，历史上曾数次遭受外族入侵。多个世纪以来，爱尔兰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包括维京和诺曼文化，因而所谓“纯粹”的爱尔兰文化其实从未存在过。远在 15 年前伴随全球化的经济入侵开始之前，爱尔兰人民就从向外移民中得到解放，自由地在其他文化里创造自己的多重身份。

对爱尔兰作为主权国家的崛起历史有所研究的人们认为，在这个国家赢得主权很久以前，爱尔兰人民早已用自己的想象力为之奠基。那些用想象力建构爱尔兰的先驱们都有流亡在外经历：最著名的叶芝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格兰，乔伊斯和贝克特则旅居欧洲。大河之舞的灵感正是源自乔伊斯作品《芬尼根守灵夜》的开头“大河流过”。乔伊斯和大河之舞共同的理想是通过一系列源自不同文化的复杂的隐喻与全世界交流。二者都用一股原始力量一以贯之，这

股力量就是全世界共同的故事，那封存在世界的神话里，用声音来讲述的故事（语言和踢踏都是声音的表现形式）。他们讲述的内容如此丰富，以至于人们今天仍在试图阐释理解它。

乔伊斯作品里的主人公史蒂芬·迪达勒斯在文中写道，他选择流浪是为了“打造自己的民族所不曾有的良心”。他深知只有走到事物的边缘，才有可能定义它的核心。大河之舞也是流亡异国的杰作，原创编舞麦克·弗莱利（和领舞珍·布洛尔）父母是爱尔兰人，却生于美国，并在美国学习爱尔兰舞蹈。整场演出原本是为在1994年欧洲歌唱大赛上向邻国展示爱尔兰风情而编排的一段七分钟转场。换句话说，大河之舞再现了海外爱尔兰群体对本土文化的影响。缺少了海外爱尔兰群体的独特视角，大河之舞不可能摆脱僵化的传统束缚，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那些僵硬的传统其实也是由历史上移居海外的爱尔兰群体所创造的。

世界各地的观众又是如何通过大河之舞重新解读“爱尔兰人”的呢？他们的观点给我们带来了新鲜视角。从中国视角来看，大河之舞能帮助爱尔兰找到重新定位自身的新模式，这种可能是否存在？身处爱尔兰的我们能否从大河之舞的成功中领悟出一种新的、实用的模式，糅合所谓“传统”和“外来”文化？从这个角度审视大河之舞可能帮助我们摒弃以往对民族认同的呆板定义，重新塑造一个全新的爱尔兰。就像多年前鹭宾·赫德在中国工作时能够同时扮演英国人、英格兰人、乌尔斯特人和爱尔兰人的多重身份一样，中国人眼中的爱尔兰人现在也可以在新世纪里选择扮演多种身份（爱尔兰、英国和多民族共存的集合体）。

从中国审视爱尔兰能激发更多思考。由于其迥异的政治传统，研究爱尔兰的中国学者常常为爱尔兰的运作模式感到惊讶。坦白地说，目前爱尔兰国内日趋严重的社会分化使这个国家的未来难以预料。在爱尔兰国内和欧盟宪法层面，我们称之为“民主”的东西正在受到冲击。一个有思想的爱尔兰人在中国可以发现，中国的治理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价值观，能够将数量巨大的人民团结起来，为共同的事业奋斗。大河之舞也具备同样的独特魅力。在爱尔兰式民主的范畴下，这种程度的同步性只能通过一种新式的舞蹈来实现——想象中爱尔兰未来的舞蹈，所有人在领舞的带领下齐声踏响一致的舞步。爱尔兰需要再次重塑自己以应对新时期的到来。从中国审视爱尔兰可知，为实现这次重塑，爱尔兰必须采取一种更灵活、实用的眼光来看待何谓“爱尔兰人”。

参考文献

- Brennan, Helen. *The Story of Irish Dance*. Kerry, Ireland: Brandon, 1999.
- Bruner, Katherine F., John K. Fairbank, Richard J. Smith, (eds.). *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6.
- Egan, Catherine. "'Still 'Black' and 'Proud': Irish America and the Racial Politics of Hibernophilia", in Diane Negra ed., *The Irish in US: Irishness, performativity, and popular 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Horowitz, Richard. "Politics, Power and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the Qing Restoration and the Ascent of Robert Hart",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40 , 2006, No. 3.
- Kilduff, Martin and Kevin G. Corley. "The Diaspora Effect: The influence of exiles on their cultures of origin", *Management*, Vol.2, No.1,1999.
- Lan Li and Deirdre Wildy. "A New Discovery and its Significance: The statutory declarations made by Sir Robert Hart concerning his secret domestic lif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3, 2003.
- McCormaic, Ruadhán. "China Comes to Ireland", in Jerusha McCormack ed., *China and the Irish*, The Thomas Davis Lecture Series 2008, Dublin, Ireland: RTE/New Island, 2009.
- Nolan, Brigit Rose,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Authenticity in *Riverda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23 May 2009.
- O' Leary, Richard, "An Irish Mandarin: Sir Robert Hart in China 1854-1908", in Jerusha McCormack ed., *China and the Irish*, Dublin, Ireland: RTE/New Island, 2009.
- O' Leary, Richard. "Robert Hart in 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Irish root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0, 2006.

(作者信息: 杰鲁莎·麦科马克: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客座教授, 都柏林大学退休教师。
 本文由罗来明翻译, 王展鹏校。)